

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论

陈红民

在中国现代史上,蒋介石和德国的希特勒(Hitler)两个人常被联系在一起:蒋介石一意仿效希特勒,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。这是写入教科书的不易之论。那么,历史上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?有人言之凿凿,却也拿不出直接而又确实的证据来,这更使他们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,扑朔迷离。

为寻找历史真象,笔者遍查有关的中外文献论著,包括:德国郭恒钰、罗梅君教授根据德国外交部重要档案编成的《德国外交档案:1928~1938年之中德关系》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)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德外交密档(1927~1947)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)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》(油印未刊稿)、美国柯伟林教授的《德国与中华民国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以《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》为名于1994年出版中译本)、吴景平教授《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——中德关系1861~1992》(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)、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《中华民国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期间》中第三编《战时外交》(1981年9月出版)等等。其中的资料不仅透彻地反映了中德关系的真象,更有四封蒋介石与希特勒间的私人通信。这些信或许不是两人间联系的全部,但毕竟为我们揭开了那层神秘面纱的一角。

在叙述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之前,有必要先概述一下当时中德关系的基本状况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德国成为战败国。除

巨额赔款外,其军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,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也受到毁灭性打击。而德国国内以军队和重工业界为代表的势力,念念不忘恢复军备,他们利用凡尔赛公约的漏洞,通过开拓全球市场,向各国输出军事顾问和武器,储备军事人才和保持军备生产能力,恢复破败的经济。同时,他们又广泛地寻找战略物资和原材料的提供国,中国是其重要的目标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加紧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准备,也加快了开拓世界(尤其是远东)市场的步伐。

在中国,国民党1928年统一全国后,提出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的主张,要求外国能以平等姿态资助其完成“国家建设计划”。蒋介石还面临着以武力镇压政治军事反对势力、消灭共产党和准备对日作战的燃眉之急,因此,争取外国的军事援助迫不及待。

除了双方急切的现实需要外,蒋介石力争与德国合作是有相当基础的:蒋对纳粹组织及其有效地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很是推崇,对德国在战败后的迅速崛起甚为钦佩,汪精卫、胡汉民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、张学良、翁文灏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曾赴德考察,此其一。当时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,正如蒋介石给希特勒的信中所称“吾两国国势相仿,目的相同”。德国是唯一在华没有特权的大国(一战后被迫放弃),两国的需要又有互补性:德国的经验、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恰是中国所缺,中国产的钨、锑等战略物资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又是德国所急需的,此其二。因而,当蒋介石的请求在英美等大国

面前频频碰壁后,沮丧之余,就全力争取德国援助。1928年,陈仪为首的考察团衔命赴德考察军事,陈仪随行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(Hindenburg)的亲笔信,蒋在信中“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,尤其在经济领域”^①。

中德关系在抗战前的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是最为密切的,双方合作富有成果。德国通过派遣军事经济顾问和输出武器及工业设备,给予蒋介石政权在军队整训改编、“剿共”战争、对日作战准备、以至重工业和交通建设、教育等方面以很大的帮助与影响。而中国提供的大量原材料,也在德国经济崛起和军备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928—1938年间,德国和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,有学者甚至提出,对蒋介石政权来说,“这是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”^②。

当时,德国在中国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,帮助蒋介石整顿训练军队,到各级部队充当教官,在作战中出谋划策。此顾问团的地位很微妙,是没有官方身份的“官方”使团:为逃避凡尔赛条约的限制,其成员是“退役军官”,由德国国防部推荐来华。他们被配置于中国各级部队,权力较大,尤其是几任总顾问塞克特(Seeckt)、佛采尔(Wetzell)、法肯豪森(Falkenhausen)对蒋的建议也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,包括不少政治经济的内容。中德政府间并无任何协议,军事顾问们是接受蒋介石个人的聘请,只对他个人负责,“也未成为脱离蒋介石控制之外的力量”^③。

为保证在华经济利益的发展,德国在中国建立了“工业产品商贸公司”(根据其德文简称“Hapro”音译为“合步楼”),由政府派军火商克兰(Klein)为正式代表来主持。“合步楼”与中方的资源委员会、中央信托局等单位开展了以中国农矿产品换德国工业品武器、建立飞机制造厂、钢铁厂和轮船公司等项目的合作,其中尤以中国的钨、锑矿砂交换德国军火的“易货贸易”最为两国重视。克兰也曾

向蒋介石提供了不少建议。

二

大约在1935年底,克兰写报告给蒋介石,分析中德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,提供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。克兰建议中的一条是要求蒋亲笔写三封信,“一致德国领袖希特勒先生;一复德国国防部长柏龙白上将;一复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”^④。以此让蒋表示对两国关系的重视。此前柏龙白(Blomberg)和沙赫特(Schacht)都已给蒋写过信,对中德友好合作“表示莫大兴趣”,而希特勒只是通过塞克特表达了愿通过易货贸易的经济途径来“赞助”蒋介石的建设计划。从克兰所用的“致”和“复”差别,可知此前蒋和希特勒似乎尚无直接的通信关系。

蒋介石接受了克兰的建议,在1935年11月23日致信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,渴望加强两国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的全面合作,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。与此同时,他还给希特勒及德国国防部长、经济部长各修一书,托塞克特转交。可惜此信无从查找,详细内容不得而知。不过从其后希特勒的复信看,大致应与蒋给塞克特信的内容大同小异。

蒋介石的呼吁并未立即得到回应。1936年,中德两国易货贸易合同签字,正式生效时,蒋介石又借贺希特勒寿辰之际于4月13日致信希氏:

德国总理希脱拉先生勋鉴:先生寿辰在迩(四月廿日),敬以充分诚意遥致庆贺。先生为德国力增光荣,时深钦佩。近时对于德华两国间经

① 郭恒钰、罗梅君主编:《德国外交档案:1928~1938年之中德关系》,第21页。

② 柯伟林:《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》(中译本),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,第6页。

③ 吴景平:《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——中德关系1861~1992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,第141页。

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中德外交密档(1927~1947)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,第19页。

济合作热心主持,合同现在签字,使国交益敦亲睦,建设得有基础,尤为欣慰,特致谢忱,敬希察照。^①

在蒋介石发出第一封信半年后的 1936 年 5 月 13 日,希特勒始给蒋回信,内称:

塞克脱上将转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函一件,至为欣感。钧座决定与敝国友谊合作,以实施建国事业,尤希(中文译希特勒之自称——引者)引为幸慰者也。希于钧座勋业倾仰已久,关切亦深,尤愿竭尽绵薄,以资推进之助。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,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,获蒙钧座异数关垂,谨为申谢。

贵代表团由顾振先生之导领,希获与之接席劳问,藉审钧座对于经济合作之感想,鄙见亦同,并深信两国互助合作所应有之先决条件已根本具备,而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,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,是以希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束至为庆幸者也。谨布尺楮以表欣感,倘钧座不遗,尚希接受敝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,藉表希个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。^②

蒋介石期望德国能派高级官员来华具体商谈合作事宜,经塞克特与克兰多方努力,当年 7 月间,希特勒派第七军军长莱谢劳(Reichenan)炮兵中将来华考察,并对中国“国防经济诸问题”提供咨询。莱谢劳是到访的德国最高级官员,希特勒的信和所赠荣誉军刀似也是由莱谢劳当面转交给蒋的。莱谢劳返德时,蒋介石也托其给希特勒带信:

荷蒙荣宠,特命莱谢劳将军聘使来华,无任欣感。莱将军临观敝邦,不独以地位见重,其丰采精神宏猷硕划尤足为两国所利赖。余于其行旌旦暮西指,实不胜怅惜之情。

信使传来藉审台端(指希特勒——引者)对于中德合作之感想,至堪欣慰。拙见主要方针已为莱谢劳将军面道梗概。莱将军当能向台端面达观缕也。货物互换合同不过为吾两国合作之基础,余极望其进展程度远超出此现有范围。敝方现已树立经济组织机构,以求提高农产及矿产效率而开发富源。今后中国供输贵国原料之可能性亦必继续增高,必使此供输贵国原料之数量足为贵国所重视也。为求目前实施开始起见,已令饬所属准予年内供给贵国以三千万华

币计值之货物。

中国国防建设期在实施,故中国之原料必须巨量供给贵国,余亦熟虑已久。

今兹西南两省归附中央,中国之统一遂告圆满实现,内政建设不惟刻不容缓,更须加紧实施,尤须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与贵国携手合作,以助他山。

莱将军对于建国行政以及国防组织、军令更新所建议各点,后者尤属重要,余甚感谢,并已采纳,令饬施行。

贵国首须有一军政学识宏富之高级参谋军官派遣来华,以资襄助一切革新工作之实施。余切望中德合作大计随时有工作实效为之保障,而两国信使往还交欢樽俎亦永如今日之盛况也。^③

蒋在信末还特意提起希特勒所赠的军刀:“前蒙赐贵国国防军荣誉宝刀一柄,以表胞泽精神亲善正意,高怀远识,良用拳拳,谨此布复。”

莱谢劳在华期间,还向财政部长孔祥熙颁赠红十字勋章。不久,国民政府也向积极支持中德经济合作的德国的国防部长柏龙白、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一批要员颁发了一等云麾等勋章,但其中并不包括希特勒。^④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档案中,还有一封蒋介石致希特勒的信,只注明是 1936 年,具体发出时间不详,内容如下:

希特勒总理先生勋鉴:前由克兰君赐交玉照一帧,猥荷荣宠,欣感无既。

向者接奉塞克脱将军来函,藉审大总理对于克兰君亲向 OO(此为蒋通常拟文书时用以自称的符号——引者)叙述之塞克脱将军各种意见表示赞同,并拟藉两国经济互助给予中国经济建设以一切提携。

大总理果断若此,则 OO 谋与贵国亲切合作之素(夙)愿一旦实现矣。谨此向大总理表章欣感,并致谢忱。

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坚毅有方领导之力,

①②③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中德外交密档(1927~1947)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,第 336、5、6、5 页。

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,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,良为OO之所钦佩也。

OO亦怀抱决心,致中国于自强之途。克兰君所传达之塞克脱将军意见,必依照实行。

赖中德两国亲切友好提携合作之力,足使敝国易达自强目的,若夫两国经济能力之联络沟通,与藉货物互换以救济两国之贫弱财力,实皆合作之目的也。

吾两国国势相仿,目的相同,故此友好合作之基础,亦可昭示久远。

OO谨致景仰之忱于希特勒总理阁下。^①

从信的内容及语气看,写信之时,以大规模“易货贸易”为标志的中德全面合作尚未开始,应该是在1935年底蒋托塞克特带给希特勒第一封信之后不久,而在中德易货合同签订(1936年4月)前。甚至有点像是蒋给希特勒的第一封信。

三

因此,就目前材料所知蒋介石与希特勒间至少应有五次通信,四次是蒋给希特勒的(包括由塞克特代交的那封),希特勒给蒋仅一封。从前引已公布的四封信的内容,我们可以对他们间的关系得出几个简单的结论:

第一,蒋介石与希特勒私人间的联系,似不应早于1935年底,而且开始之时双方还在互相摸索,互表“钦佩”,并非“一见如故”。蒋是在他人的建议之下才给希特勒写信的。有趣的是,在这四封信中,希特勒的名字竟有三种中文译法,以其出现的先后分别为:“希特勒”(1935年11月)、“希脱拉”(1936年4月)、“希特忒”(1936年5月希特勒来函落款署名翻译),以后就统改称“希特勒”了。外国人译名混乱的现象在30年代不足为奇,但出现在希特勒这一重要人物和非常正式的官方外交文书中,似乎也能曲折地反映点什么。

第二,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,都希望促成两国间的全面合作,所用言辞也与当时两国的处境与各自的身份相吻合,更多地是用了客气得体的“外交辞令”。虽然蒋的合作意愿

更强烈些,但其言辞也没有超过正常的“公务”范围;除希特勒赠蒋的照片和荣誉军刀外,来往信件中极少有私人感情的色彩。

第三,通信中讨论最多的是当务之急的两国易货贸易、经济互助及德国军事顾问问题,较少涉及其它。至1936年9月蒋介石才表示“极望其进展程度超出此现有范围”,对蒋期望德国能派“军政学识宏富之高级参谋军官”来华“襄助”的请求,希特勒一直未予满足。由此可推知希特勒与纳粹德国在此前的中国法西斯运动中,没有直接地推波助澜。

蒋介石与希特勒私人间鸿雁传情之日,正是中德关系“蜜月”之时。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前夕的1937年6月,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应邀访德,受到隆重的接待。希特勒在接见孔时强调了中德关系的重要性,他并称赞蒋介石是“中国负有天赋使命的伟人”^②。

客观地说,基于双方利益需要的中德关系并非是平等的,蒋介石对希特勒的依赖更大些。希特勒发展对华关系,是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,但他计划发动的是一场“闪电战”,不需长期的战略物资储备,因而“他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”。况且,“雅利安种族优越论”决定了他对中国这一弱小民族的歧视,在希特勒《我的奋斗》一书中,他将中国人与黑人同列为“劣等民族”,因而遭到中国驻德公使刘崇杰的非正式抗议^③。

30年代由日本侵华而引发的中日矛盾,对中德关系的发展牵制甚大。希特勒等德国政要们既企图维持在中国的利益,更不惜牺牲中国来谋取与日本结盟,中国在他的战略中充其量只能是配角,“希特勒决不会因中国

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中德外交密档(1927—1947)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,第7页。

② 程天放:《孔庸之先生应邀访德——使德回忆之十三》,《传记文学》第6卷第3期。

③ 郭德钰,罗梅君主编:《德国外交档案:1928—1938年之中德关系》,第55页。

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回报”^①。30年代初,德国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,与“满洲国”进行贸易,与日本缔结“防共协定”。日本全面侵华后,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(Trautmann)奉命调解中日关系,即著名的“陶德曼调停”。失败后,希特勒即在日本要求下,下令停运本该交给中国的军火,强迫在华军事顾问回国。1938年2月他在国会宣布:“德国将承认满洲国,以抛弃过去不可能之幻想,而尊重现实。”^②中国方面的抗议未能起任何作用。蒋介石政权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日趋淡化,处于若即若离之状况。

1938年底,蒋介石派陈介为新任驻德大使。德国方面很是怠慢,几个月不安排递交国书。蒋介石十分气恼,11月24日致电行政院长孔祥熙:

德外(交)部对我派陈大使递国书事,仍再三延期,显示不认我政府,至少亦有藐视我国书之嫌,应即照前电速令陈大使离德或正式召其回国,以调国内其他名义为名亦可,总之不可再令其驻德,否则国家与政府威信与体统全失,此种耻辱将无法湔雪矣。^③

冷淡的关系没维持多久,1941年7月,

德国承认汪精卫伪政权,国民政府宣布关闭柏林使馆,实行对德“绝交”。蒋介石政权与希特勒德国的关系彻底破裂。

5个月后,太平洋战争爆发,中国于12月9日正式宣布,对日本、德国、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,加入“民主阵营”与法西斯阵营作战。由于地域的关系,中德之间并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。战争的结果,德国战败,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自杀;中国获胜,蒋介石则赢得了一定的声誉。

中德两国间,抑或蒋介石与希特勒个人间这种大喜大悲的结局实出人意料,恰如柯伟林教授所言,这在几年前看来,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”。

[作者陈红民,1958年生,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]

① 柯伟林,《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》(中译本),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,第171页。

②③ 《中华民国史料初编——对日抗战时期》第三编《战时外交》(二),(台湾)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编印,第670、第691页。

· 读史琐记 ·

《元史》正误一则

· 刘 晓 ·

中华书局标点本《元史》卷一百五十三《高宣传》在叙述其曾孙塔失不花的仕宦时,谈到他在“大德元年,授奉议大夫、章佩监丞。四年,改朝列大夫、利用监丞。八年,升少监。武宗即位,授中议大夫、秘书监丞”。其中的秘书监丞,记载有误,标点本漏校。

据《元史》卷九十一《百官志七》,奉议大夫为正五品,朝列大夫为从四品,中议大夫为正四品。这表明,

塔失不花的散官阶是在一步步地提升的。而其职官由监丞升到少监,却又降回到监丞,这就令人费解了。查浙江古籍出版社标点本《秘书监志》,该书卷九《题名》中的秘书监条目下,有“高塔失不花,至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以中议大夫上”的记载。则塔失不花由利用少监又升为秘书监,而不是降为秘书监丞,秘书监丞的丞为衍字,当删。